



考古学概念的考古*

◆ (捷克)贾洛斯拉夫·马里纳 & 泽德奈克·瓦希塞克(J. Malina & Z. Vašíček) 著

◆ 陈 淳 (复旦大学文博系)

译

译者按:中国考古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虽然我国学界将“考古学”这一术语对应于英文的 archaeology,但是“考古”这个术语和概念却是本土的含义,它源于宋代《考古图》。因此,这种将本土术语对应西方的概念,最大的问题是对译的意思并不契合。《考古图》的本意,是用古代器物及其铭文来考证古代的文献记载,因此中文的“考古”也明显带有考证的意思,是文献学的延伸。英文的 archaeology 由来自拉丁文的词根 arche 与英文的词尾 ology (…学)构成,arche 的原意并非中译所意指的“考证古代”,而是“开端、来历、起源”的意思。此概念的来历可以追溯到古代圣贤最初对世界万物来历的冥想和古希腊哲学家对宇宙、自然、人类和社会起源的思索,后来才专指对人类史前史的探究。今天,考古学被定义为一门从物质遗存来探究人类历史的学科,从该术语的本意出发,这门学科应该被理解从物质材料来探索人类的来历,了解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是如何产生,以及又是如何发展到今天这种状态的。这篇摘选的译文详细介绍了 arche 概念的来历,以及考古学早期科学化的过程。作者从老子、孔子、释迦牟尼、《圣经》作家说到汤姆森和蒙特柳斯,为我们梳理了考古学这门学科的诞生过程,是对考古学概念本身一次很好的梳理和“考古”。

arche 的来历

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冬去春来的转变是难以察觉的。然而对于自然界而言,这却是重生之时,她又获新生。两千五百年前,旧大陆弥漫着一种相似的预期氛围。旧大陆相距遥远又彼此隔绝的伟人们——中国黄土地上的老子和孔子、印度烈日下的释迦牟尼、伊朗绵延山脉中的查拉图斯特拉(拜火教的创始人)、死海岸边《旧约全书》的预言家们,同时开启了人类发展的一个新纪元。希腊的奇迹开始在地中海成型,其后有朝一日将成为欧洲和大西洋的文明。

直到那时,世界仍像是一个谜,人类活动屈从于神秘的方式。而神话几乎代表着人类知识的全部。

但是,这些人带来了变革。即便他们的思想受到神话的影响,但是这些神话已无法禁锢新的思想。于是,理论的思维开始出现,它能以崭新的方式理解社会和自然界,而且它能够审视自己的设想。每个思想家的传道解惑成为一种认知的基础,起先它只是吸引个别的追随者,后来则是整个民族。以

后得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补充,这些思想体系成为世界主要社会体系的基础。以这样的方式,公元前第五世纪标志着神话时代的结束和人类历史时代的开始,它标志着整个文化领域和我们作为其继承者的所有传统的开始。卡尔·雅思贝斯恰当地将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

正是在这时候,在古希腊,诸如考古学、历史学和哲学的概念在新思想方式的背景中出现了。最初,这些术语在含义上与今天有所不同。

让我们从历史的概念开始。每个小学生都知道,“历史”一词首先是“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其题为《论证历史》(Historias Apodeixis)一书中采用的,总的来说是意指调查和研究。后来,亚里斯多德将该术语更加精确地定义为调查所有能够通过个人经验观察的、或者能够通过报道追溯的经验性事件。这样的定义仍试图涵盖所有经历的或报道的过去事件,并且进而涵盖生物学和地理学。因为古希腊人收集有关这些课题的信息,大部分是以报道有关遥远地方、外国人和自然奇闻的形式,因此出现了一种较为分门别类的需要。

* 摘译自:Malina, J. and Vašíček, Z. Archaeology Yesterday and Toda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标题为译者所加。

普林尼的《博物志》(Naturalis Historia)并非描述自然史,而是谈论自然界的奇闻轶事,而这种方法一直很好地延续至今。对于弗朗西斯·培根的《自然史》(Historia Naturalis)仍然是一种描述性的说明,将对自然事件的调查留给了理论科学、物理学的领域。直到1575年,J.利普修斯在自然史与叙述史之间做了明确的划分。大约在1694年,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仍将宇宙史、地理学、古物学、哲学和文献史都列为“人文史”的组成部分。

因此在过去,历史学并不涵盖如同今天一样范围的现象。亚里斯多德认为,历史在其年代学意义上只不过是政治和军事事件的链条。他并不认为历史有其自身的价值。尽管如此,正是在这个时候,历史过程在希腊人当中成了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希腊城邦的公共行政管理通过商贸,与其他希腊聚落以及与国外的野蛮人往来,而这使得对于负责任的政府编撰和组织历史和地理事件成为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抽象社会关系的发展将艺术以一种特定的独立价值从宗教活动和孤立美的制约中解放出来。同样,“好”这个概念与其直接的社会背景分离。以这样的方式,希腊民主成了希腊历史的基本条件。结果,所有经验性知识十分自然地作为历史记录下来。

另一方面,理论知识被说成是哲学,它被认为涵盖了所有理论。这仍剩下一类现象:即我们直接经验无法企及的经验性事件,而且它们并没有留下任何个人的记录。这个空白便由考古学来填补。柏拉图在《大系比阿篇》中,将考古学形容为一种关注最遥远过去的科学,称其为“老祖母令人愉悦的神话故事”。在古人眼里,如果考古学具有任何价值的话,那它就是历史在年代学上的延伸。于是,早期学者将考古学看作是最遥远的历史事件。例如,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塞库鲁斯写于公元前一世纪的《历史文库》(Bibliotke Historike),和狄奥尼西奥斯介绍罗马起源的著作《罗马考古》(Romaike Archaeologia),就是如此。直到18世纪末,考古学仍然是过去历史尚存疑虑的延伸,当时康德将他有关太阳系起源的星云假设称为“自然的考古”。根据康德,“自然的考古”包括对缺乏可信证据过去的陈述,因此必须视为假说,而不能成为理论。明显的是,就认识其为一门严肃和经验性学科而言,考古学在二千年间没有什么进步。

让我们回到考古学(archaeology)的含义。最

初,它被视为有关 arche 的知识:它是指除了结果之外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的开端、来历、起源。自那时之后,希腊思想家对起源冥思苦想。根据辛普利修斯的看法,是阿那克西曼德(公元前611~547,古希腊天文学家、自然科学家)首先采用了 arche 这个词。亚里斯多德将泰勒斯(古希腊哲学家)的水形容为 arche——原始状态和万物之源。恩培多克勒(古希腊哲学家)意在解释“每件事物最古老的开端”。而亚里斯多德认为,“着手进行的最佳途径应该是从一开始便追踪事物,并观察它们如何变成目前的状态以及它们是如何发展的”。

开端被认为理所当然,因为它们肯定总是如此。大家承认,有关开端的知识是最重要的,因为任何事情都有其开端,它事先决定了以后的发展。古代社会和文化起源的极其重要性源自它们与神话世界的密切关系——直至今天我们还没有从与神话的关系中完全解放出来。在神话世界里,大部分人类行为命中注定只是模仿神话中英雄的行为。过去和现在是一回事,当它们后来被分开,其相连的环节——世系——就变得特别重要。祖先和血统便决定了一个人现实的存在,一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所有这一切都是由法定而继承的。

在历史的初始,在没有记录的起源与存有记载的晚近过去之间,时间距离看似不大。因此,起源自然被认为对现在生活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影响。世系提供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

宇宙发生之谜意在解释万物之初,世界和人类是如何形成的,它们如何变成现在的状态。宗教的宿命思想将所有东西都归结于初始,后来的发展只不过是原始状态的延续而已,因此排除了任何进化的思想。

在古代和中世纪,由于知识在向其他方向拓展,因此很少用“考古学”一词。Arche 并非被看作是万物的起源,而是被认为是某些事物的起源。当知识变得更加专门化,arche 本身作为该过程的一部分也变得更加专门化。相应的,因为每门学科定义了自己关注的范围,因此花在解释开端的力气上减少。起源的重要性开始被视为虚有其表,而非真正如此。

欧洲文明认为历史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最重要的是一种了解社会的途径。虽然历史知识在谱系意义上仍然存在,但是历史学的一种不同功能变

得十分突出:即检视其自己的假设。所以,从这点上,历史学是作为同时关注了解社会和影响社会的一门学科史而发展的。

在中世纪,西方文明的开端是通过《旧约全书》而详述的。因此,这就无需独立研究人类的起源,具体这样做很可能是一种亵渎。唯一认为值得正当询问的问题是圣经事件与古代世界所记载的历史之间的联系问题,以及为特定封建政体从古代贵族家庭或民族寻找传承谱系的问题。而且,根据犹太教年历,创世以来只有五千年的时间,使得更古老的史前开端没有容身之地。因此人们觉得,既没有必要,也没有一种年代学或哲学的框架来容纳圣经范式之外世界那怕是一些孤立的发现。

就这种情况而言,出现能够加以观察和分析的考古证据,对这门学科的建立而言是决定性的因素。那时,询问过程构成了方法论的基础,它将考古学置于一个超越纯粹猜测的层次上。在这点上,考古学模仿了其他较早建立起资料库的学科如生物学或地质学。于是,比如让科学考古学成为可能的蒙特柳斯整个分类系统,只不过是某种方法的完善,古文字学就是从这种方法获得科学资质的。

维罗纳教会图书馆是自第五世纪以来就一直保存手稿的图书馆,1713年S.玛菲对该图书馆的调查,使得他能够将古文字学作为书写发展的一门科学建立起来。书写是人类文化的一种工具,其变迁构成了一种进化的链条。一百五十年后,史前工具根据它们的形状确立了其进化的过程。奥斯卡·蒙特柳斯将一种相同的方法用于考古学。但与前者相比,他并没有受比较方法而是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指导。

地层学和类型学的分类是这样一种方法,用它们可以对考古器物从时间上排序。但是,对年代序列的阐释自18世纪以来几乎是所有学科对进化思想密切关注的课题。关注遥远过去的学者不是建立他们自己的进化概念,而是依赖由其他学科建立的方法,并为这些学科提供支持的材料。

在考古学自身范围内,概念和理论的应用上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过去有,现在也有,国家的整个考古学界专致收集器物 and 编撰材料,但并不应用理论。考古学理论和方法论上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史前考古学而非由原史或历史考古学所取得的。同样,是考古材料贫乏的北方,而非材料丰富的南方促进了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进步。不得不在埃及

法尤姆发掘难度很大遗址的皮特里,被迫发明了原创和细致的方法,这是那些拥有丰富和容易发掘遗址的人所做不到的。

今天,考古学被认为是根据物质材料如器物、纪念物和其他遗存来研究过去的一门科学。因此,强调的是物质材料的性质。从一开始,这门学科的方法论是有选择地采纳其他学科的方法与经验。考古学的概念框架便以一种相同的方式建立起来。只是到了今天,我们才见证了审慎和广泛的理论和方法论的重构,其目的是要与科学的总体发展保持同步。然而,仍然缺乏对 arche 本身的研究与回顾性评估。

正如不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事件就无法理解一个国家的历史一样,如不了解科学和知识的历史,那么考古学的历史也无从了解。因此,对于这门学科的研究而言,与其他学科以及一般性哲学氛围的关系就像它特定的理论方法一样重要。

考古学在19世纪诞生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老方法就能一笔勾销,或者它们就能被认为是幼稚和毫无价值的。相反,arche的反思并未消失,只不过这种思考采纳了一种新取向。事实上,它一直是考古学的组成要素,仍以相同方式来研究古物。就不同学科对 arche 的思考,以及对一般的科学方法论和理论进行观察时尤其如此,换言之,对某人本学科的假设进行分析。史前遗存不仅对考古学开放,而且也对其他所有学科和一般的科学知识开放。

在关注物质现象中,考古学为 arche 不仅从时空上来组织史前事件来进行研究,而且对器物进行持续的观察上提供了一般性的基础,于是为利用它们来检验假设提供了机会。但是,假设又从何而来?

完全依赖归纳提出假设的想法早就失势。而且,考古学中在制定假设和对结果做演绎与检验之间的区别尚未充分受到重视,常用的程序是采纳其他学科的假设,将它们修改一下以适用于考古学的问题,而只到那时才尝试解释。一旦这种假设结构被考古学所接受,它们很快就被认为是一种常规的程序。其他考古学常用的方法,是对发现物的分类和排列(seriation)。在此,提出了定义类型和类型学系列的规则,尽管是直觉,但每种具体的类型学事实上构成了对其功效的检验。今天,当我们采用聚类和因子分析时,我们事实上就在检验分析本身的设想,例如,所采用的相似性程度的适用性。

最后,从不同科学如社会学、社会与文化人类

学、民俗学和心理学来的假设按它们的年代学维度进入考古学。对于这些学科,或对于它们与 arche 相关的方面而言,考古学仍然是一门关注没有确实证据事件的学科。总之,这些科学如不推测它们的过去就一事无成。事实上,这种推测对于这些科学的其他方面的进展而言,发挥着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不管是古心理学的假设,还是有关原始语言的假设,在它们的学科中都没有任何可以检验的证据,但只有根据当下科学的情况或通过逻辑一致性的暗示来论证。作为假设,它们不是根据过去的具体知识来构建的,而是在这些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特定框架中提出来的。然而,它们无法从通过考古学所积累的器物 and 知识中获益,而同时又为考古学对过去的重建提供检验。

将 arche 作为开端来对没有证据的过去进行思索,实际上是一种逆向预测,是对过去的“预言”。当我们思考人类的未来时,我们往往始于各种事情的当下状况及历史知识。然后从这些信息,我们设法定义可能性的范围。Arche 也是以相同方式来探究的。我们可以始于相同的设想,然而逆向进行。从这点上,我们当下的状况以及我们对这种状况的理解对于我们对 arche 的解释显然是决定性的因素。即便我们努力消除所有当下的观点,但是我们仍然采用现在研究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考古学一直和仍然是以今论古的一种探索。因此,对 arche 看法的历史,就是对整个世界研究方法和看法的历史。

考古学的最早形式

在古代,虽然考古学被形容为“对没有证据的经验事件的推测”而定义了该学科的范围,但实际上考古学是哲学的一个边缘性领域。哲学密切关注各种神话,对此其采用了一种审慎的途径:神话学(mythology)开始被视为一种模式或一种机会来做比较研究。

最初,哲学集中在对宇宙起源的研究上,这也是神话学研究的课题。起源、宇宙的形成和运转起初部分、后来则全部被解释成由自其本身的存在发展而来的。结果,古代哲学家意在说明宇宙中各种动力运转的方式和规则。虽然解释仍然以一种故事的形式,但是重点已从纯粹的叙述转向定义因果关系。

对于神话而言,没有人觉得需要验证哲学的推理。在可能和真实之间并没有做清晰的区分,在事实和想法之间的直接对应上也无需加以论证。每种论点只要合乎逻辑和没有矛盾,或不违反常理,就

被认为是正当的。柏拉图声称,有关一直流传、持续存在以及由思想解释的说法都是可靠和不能排除的。但是,没有机制来检验假设,也没有适当数量的特定观察来从特定层次而非一般层次上支持假设或理论。这意味着,在有关宇宙起源与性质的一般性陈述和经验观察之间存在空缺,该空缺只是很晚才被特定的科学学科所填补。

神话逐渐被有关宇宙、人类和社会起源的整套思想所取代。柏拉图的哲学,人类摆脱部落状态的新哲学是新方法的很好例子。柏拉图观察了概念性思考的发展,同时提出了抽象概念的一种等级框架。柏拉图并没有质疑方法论的和具体宇宙发生模式根本的正当性。结果,在他生命的终点,他在《蒂迈欧与柯里西亚斯》中接受虚构看法作为研究的真正目的,这些对话实际上不仅是绝对的考古学,也是绝对的宇宙发生论。

在从一般性上考虑人类状况和社会时,我们能分辨自然事情的几种阐释,其中一些是矛盾的。特别是,对自然事情的解释,基于一些对什么是人类自然行为与生俱来的了解,可以与强调社会的存在与社会控制是自然固有的观点来对比。第三种观点是认为只有大自然是自然的,而生命作为人类的目的与之相一致。

对柏拉图而言,国家形成是因为人类没有它就无法满足他们需要,但是它的体制是上帝赋予的。自然、原初、敏锐和理想融合在完美国家的模式中。

对亚里斯多德而言,人类是一种政治动物,一种社会动物,它将人类等同于一种超级、自然的结构来控制,好似一种有机体。社会是基于一种管理的自然形式,劳动分工、男女有别、主仆关系被理解为事情的自然状态。

卢克莱修重建了社会的整个进化,从最早像野兽般生活的存在,到家庭、氏族和国家的形成。国家由契约而形成,社会的进化追随着技术的变迁。

人工器物的收集也始于古代。在公元前 16 世纪,巴比伦国王纳波尼杜斯在其王国早期庙宇和宫殿的废墟上从事发掘。公元前 7 世纪,亚述巴尼拔国王建立了一个古苏美尔和阿卡德文献的图书馆,并收集了一批公元前三千年的古董。在他图书馆入口有一段话:“我认为石头上的字源于大洪水时代之前”。起初,收藏基本上出于宗教目的,后来,特别是在古罗马,它成为显赫与地位的一种表现。

最初利用考古证据来检验一种假设也在远古

世界所从事。公元前 15 世纪末,修西德底斯确认,卡里亚人很早就(希腊)德罗斯岛上居住。根据考古学背景与现代卡里亚人葬俗之间的共性,他认为他的推断是正确的。

考古学之前的考古

由于艺术史的发展,艺术品成为历史学的一部分。那时候,考古学概念是作为一门关注纪念物及主要是艺术品性质的古物的学科而引入的。因此,英国有关艺术的第一本杂志叫做《考古学报》(Archaeologia)。文艺复兴时期考古学为现代古典考古学奠基人之一——温克尔曼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对古代纪念物的兴趣,成为新收藏活动的主流。彼得拉克的名言“保存罗马荣耀的纪念物而一举成名”,说明了这项活动感情与审美的感召力。考古学概念扩大到涵盖几乎有关过去的所有信息。在文艺复兴时期,考古学包括钱币学、铭刻学和艺术史。例如,安科纳的西里亚克不仅被认为是“考古学之父”,而且也是铭刻学之父。同样,J.斯庞将考古学解释为一门关注过去物质遗存的学科,进而将其细分为铭刻学、肖像学、玉石雕刻学、古建研究、浮雕和手稿研究。晚至 18 世纪中叶,J.F.克赖斯特将考古学理解为艺术史、铭刻学和古文字学等的集大成者。

这种广泛的兴趣反映在该学科的组织上,首先是通过学会基础而建立起来的。1478 年,最早的古物家学会在意大利成立。1717 年,英国成立了古物家学会,并在 1751 年从乔治二世那里获得皇室特许。1630 年,瑞典君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成立了瑞典皇家古物家学会。那些对考古学感兴趣的个人和学会本身也关注文学、历史学、文献学、地理学和生物学。古物考古学纯粹是作为他们广泛兴趣的一部分而形成的。

尽管考古活动体量大增,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考古学仍停留在专门收藏“奇珍异宝”的层次上。史前器物仍然被偶尔而非刻意采集,发现物和纪念物仍然被视为过去个别的遗存,并没有设法做出较为全面的解释。这种“珍宝”考古学一直延续到 18 甚至 19 世纪。但是,随着藏品日益增多,开始设法对它们进行分类和系统化。由于史前器物是最后被发现的,因此它们在文艺复兴视角中的最晚趋势首先在意大利被反映出来。

大约 16 世纪中叶,意大利文艺复兴学者成功企及了古代那些伟大学者的大部分基本著作。这些

古典作品保存了荷马和赫西奥德的观察,反映了公元前 9 世纪的希腊生活,而在荷马的案例中,也有后迈锡尼时代的口述传统。在这些及其他著作中,保留有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时期的当时记录,还有民族志对较早存在石器时代的推测,正如希腊人亲眼从他们野蛮邻居中所见到的那样。但是,就我们所知,古希腊人从未设法将哲学推测应用于考古学背景,或对出土的石器、青铜器和铁器做出正确的年代学序列排列。从缺乏对这种想法的实际应用上,我们看出了文艺复兴与古典学方法对待过去的根本区别。

意大利学者饶有兴趣地阅读古典著作有关不同时期的演替,其中使用石器早于使用青铜器和铁器。这些是基于古代传统和观察的想法,与史前器物没有任何关系。农人会挖出和保存史前器物,仍然相信它们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雷石,带有神秘的魔力。这些器物的天上起源甚至被载入“习得”的文献之中。

文艺复兴在将器物看作是史前遗存的古典学解释与将这些器物视为超自然起源的中世纪通俗信念之间引起了直接的冲突。与古代的哲学方法不同,文艺复兴学者马上就到田野中去寻找这类器物,并将它们与其他有趣的珍稀物品归在一起。在这种背景下,有些学者斗胆提出,这些发现是人工制品。比如 1546 年,G.阿格里柯拉拒绝天上起源的看法,而著名的解剖学家和生物学家 U.阿德罗范迪断言,石器是史前人类在懂得使用金属之前使用的,并对来自普林尼的质疑坚持自己的说法。最后,米歇尔·默尔卡蒂在他的著作中将农人的实际观察、古典学者的知识、最新的发现与他自己时代的看法综合到一起。然而,这仍然没有消除石器工具是超自然起源,或陶器是自然力形成的看法。

默尔卡蒂首先是一位博物学家,作为梵蒂冈植物园的主管,他拥有一批矿物和化石藏品。同时,他又是教皇克莱门特八世的医学顾问。作为一名田野生物学家,他也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石器问题。文艺复兴的教育赋予他普林尼、卢克莱修和费斯图斯著作的良好知识。因此,他知道有关石器、青铜器和铁器相继阶段的古典理论。作为一名虔诚的梵蒂冈教士,他也受到了其他古代口述传统重要编撰的启发,将与荷马史诗相符的旧约全书作为石器和青铜器的一个参照依据。非利士人引入铁器冶炼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说明。默尔卡蒂思想过程的第三个要

素及最后的领悟,是由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学者、传教士和旅行家带到梵蒂冈的亚洲和美洲不断增加的有趣采集品。这三个方面是默尔卡蒂阐释的起点。与阿德罗范迪及其他学者一起,默尔卡蒂坚称,田野里发现的器物是史前的人工制品。他第一次直接将它们与假定存在石器、青铜器与铁器时代的古典框架联系起来。

默尔卡蒂的手稿只是他有关矿物和化石的伟大著作 *Metallotheca* 中的一部分,它被放在梵蒂冈图书馆里,直到 1717 年才由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将其出版。甚至作为一部未发表的手稿,默尔卡蒂的工作也影响了几代博物学家。虽然他不能被看作是一名考古学家,但是他的工作包含有被汤姆森在三百年后独立再次发明、并构成了现代考古学基础的要素。

现代考古学的诞生

19 世纪,代表前一时期教士和学者单打独斗的人物逐渐被数量持续增加的专业人士所取代,他们作为一批新的社会群体脱颖而出。即便他们的独立性从义务上仍限于他所代表的社会阶级。

发展的思想和比较的方法,还有历史批评开始用于考古学。事实上,这些方法的使用十分相似。在这种背景下,19 世纪考古学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明显的是,这些变迁的基础是在较早时候奠定的,在许多情况下,古物考古学的传统形式与史前考古学并行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对 1820 与 1880 年代的考古学加以比较,我们会看出这两门学科的质量差异很大。

作为与最初定义古物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的不同途径,史前考古学需要定义它自己的研究范围与方法。结果,它是作为拥有自己身份的学科诞生的。汤姆森的技术框架将史前器物从其古物学的窠臼中解放出来。汤姆森将器物分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然后他从年代序列来研究这一框架,石器最早、铁器最晚。当然,汤姆森的三期论体系有明显的先例。除了古已有之的模式,以及较早文艺复兴所述及,好几个启蒙运动学者提出过相似的框架。后来,在 1813 年,丹麦历史学家维德尔·西蒙森思索着石器、铜器、青铜器和铁器时代的存在。瑞典的 J.G.G. 布鲁塞柳斯在他 1816 和 1818 年出版的著作 *Specimen Antiquitatum Borealiæ* 中支持相同的看法。法国考古学家 F. 茹阿内在 1814 年也提到了三个时代的存在。十年后(波兰)布雷斯劳的

J.G.G. 布什钦也提出了这种见解。但是,他们都没有进一步完善他们的想法,而只有少数学者将这种概念专门与考古材料联系起来。显然这只是由汤姆森做到的。大量的史前采集品以及对它们的分类,成为汤姆森对了解史前器物作出贡献的组成部分。

以罕见的勤奋和热情,罗马时代考古学家寻找和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古物,它们为私人收藏而后又由公共博物馆所大量积累。他们甚至向公众分发调查问卷,以这种方式收集有关器物本身有价值的信息。这种活动遍布欧洲:只要提一下波希米亚的 V. 克罗尔姆斯神甫和法国的阿贝科歇,他们是当时积极参与调查古物的两位传教士。汤姆森将对古物的强烈兴趣和对法国哲学思想的了解与源自家庭经商的实践经验以及对物品的分类融为一体。这些资质在他 27 岁的 1816 年发挥了作用,他被皇家古物保护与收集委员会任命为没有薪酬的秘书。对于这个机会,毕晓普·芒特做了如下鞭辟入里的评论:“汤姆森先生是一位成就卓著的业余学者。确实,虽然他学习拉丁文,他不是一名大学生。但我强调,就我看来,就考古学的现状而言,这是并非重要的问题。一个人从何处获得知识并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他是否具备这种知识”。

1816 到 1819 年间,汤姆森开始整理皇家委员会日增的古物藏品。1819 年,这些藏品在哥本哈根的前圣三一修道院即现在的北方古物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开始,汤姆森看来只是将他经商获得的分类经验用于史前器物。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汤姆森将器物从式样和连贯性划分为石器、青铜器和铁器,从他工作一开始就是这样做的。因此,断言汤姆森在没有经过事先的深思熟虑就建立起其框架的批评是错误的。从一开始,汤姆森相信三期论起初也许是一种有用的参照框架,后来则作为具有重要预测意义的概念模式。

汤姆森对三期论完善的第一阶段随着博物馆在 1819 年开放而十分明显,该博物馆后来成为国家博物馆。起初,三个时代是安置在三个展厅里说明的。对该模式的进一步完善,使得它在 1848 年出版的《北方古物指南》一书中做了充分介绍。除了由汤姆森的主要研究之外,斯堪的纳维亚皇家古物学会的一些其他学者,也对该书作出了贡献。该书在 1817 年和 1848 年分别被翻译成德文和英文,还有汤姆森的通信以及与其他学者的接触,使得三期论迅速传遍欧洲。

后来,对三期论意义的诋毁开始变成了时髦。诚然,如果考古学后来的发展不对汤姆森的一些想法进行修改那是奇怪的。但是,如果说汤姆森的工作没有先例,成了最伟大的发明,那也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想对汤姆森的工作做中肯的评价,那么我们必须从汤姆森之前自器物藏品获得的信息价值与之后的信息价值做比较。在汤姆森用储藏在博物馆中大量的藏品来论证他的框架之前,考古学家面对的是一堆毫无关联的凌乱信息。汤姆森根据技术演化,将他的信息组织成了一个清晰的年代学框架。结果,他又根据地层学证实了这一框架的正当性。不管三期论如何粗糙,它无疑是将技术、功能和经济方法引入史前史、文化分类学概念、比较元素和类型学方法的肇始。在这些概念工具的帮助下,史前器物突然成为丰富的信息来源。汤姆森无愧于将考古学引入科学殿堂的功劳。

技术和形态的标准,诸如打制和磨制石器工业之间的区别,或1842年H.施赖博对青铜斧的分类,进一步将新的尺度引入原来的框架中。1834年,F.茹阿内在一本地方杂志上介绍了一项观察,提出了以后才被承认的旧石器与新石器时代。根据从法国南部两个地点出土的打制和磨制石器,他指出磨制石器的时代要晚于不知磨制方法的年代。S.O.马勒强调功能比较研究。J.J.A.沃尔塞无愧于创建了比较方法的功劳,他认为,只有这种方法才能追溯古代的伟大事件。比较方法的应用由日益精确的发掘而提高,现在目的是针对信息提炼,而非仅是值钱的珍宝。大约在1840年代,沃尔塞建议绘制和描述器物在遗址中的空间和地层位置,并强烈要求保存显然没有价值的遗存如动物和人类骨骼。更重要的是,他将整套器物组合的重要性置于个别发现之上。他自己的调查就是按这些原则谨慎从事的。

组合及其与其周边环境的概念,逐渐取代了古物学家对待发现物的态度。虽然K.冯·卢埃佐夫、G.C.F.立舍和R.微耳和都强调组合的重要性,然而奥斯卡·蒙特柳斯将这些思想完善成清晰的方法论程序。地层学方法早在17和18世纪就被零星采用,但是从19世纪初开始变得较为普遍。于是,在1797年,约翰·弗里尔能根据火石工具的埋藏位置估计它们的年代。1814年,L.J.特洛尔根据地层学确定泥沼中发现物的年代。几年后,C.皮卡德和雅克·布歇·德·彼尔特以特洛尔为榜样,调查了索姆河的阶地。布歇·德·彼尔特在1828年对他最初

发现的火石工具做了如下陈述:“我不是科学家,只是一个科学爱好者。在那里,所有人对石器熟视无睹,但我是第一个认出它们的人。”他继而声称,发现在没有扰动的地质层位中、其年代明确属于第四纪的粗糙打制工具(后来被鉴定为手斧)是由“大洪水”之前的人类制作的。1837年,E.拉尔泰采用洞穴沉积的地层学来估计这些层位以及其中出土器物的年代。在1850年代,沃尔塞利用地层学原理来检验三期论的正当性。

在地层学方法的发展过程中,参照地质学地层来论证发现物的年代发挥着关键的作用。

在较早时代,考古发现被置于一种完全不同的年代学视角中。比如在英国,与人工器物一起发现的化石被说成是被罗马皇帝克劳狄斯带到英国的大象遗骸,并以此来对这些器物分类。英国的威廉·巴克兰和法国居维叶领导着反对存在大洪水之前人类的争论,拒绝承认由绝灭动物、石器提供的大量证据,在某些情况下,在法国、英国和德国洞穴封存的地表下还有共存的人类遗骸。直到1850年代末,均变论的观点才压倒了居维叶和巴克兰的观点,极大延长了人类的古老性。

采用地层学方法导致对地层更加详细和精确的划分。这不只局限于少数遗址,而是适用于大部分有层位的遗址,这得益于类同的地质层。这使得第一次有可靠和清晰的程序来建立相对年代。这对于较早的史前史尤其如此。

同一时期,我们也目睹了类型学观点的逐渐形成。其源头可以从诸如P.奈特在1812年所做的观察见到,当时他指出,有些磨光石斧用做青铜斧制造的原型。1835年,C.皮卡德分辨出打制的石斧是后来磨光石斧的祖型。1836年,汤姆森考虑根据形状和装饰进行相对断代的可能,同一年,G.克莱姆设法为青铜斧建立一个进化的类型学序列。1842年,H.施赖博沿相同路径进行探索。在19世纪下半叶,很可能受弗格森《艺术中真美的原则》的启发,该书将主要重点放在艺术通过风格而完善的进步上,皮特-里弗斯将军重建了个别器物类型和武器的技术演化序列。但是,两位为类型学方法奠定了根本基础的人却来自瑞典,他们是H.O.希尔德布兰德和奥斯卡·蒙特柳斯。他们两人都将希尔德布兰德父亲B.E.希尔德布兰德获得的知识用于考古学,后者于1846年在钱币学中创建了类型学方法。